

# 鲁迅与章廷谦校点的《游仙窟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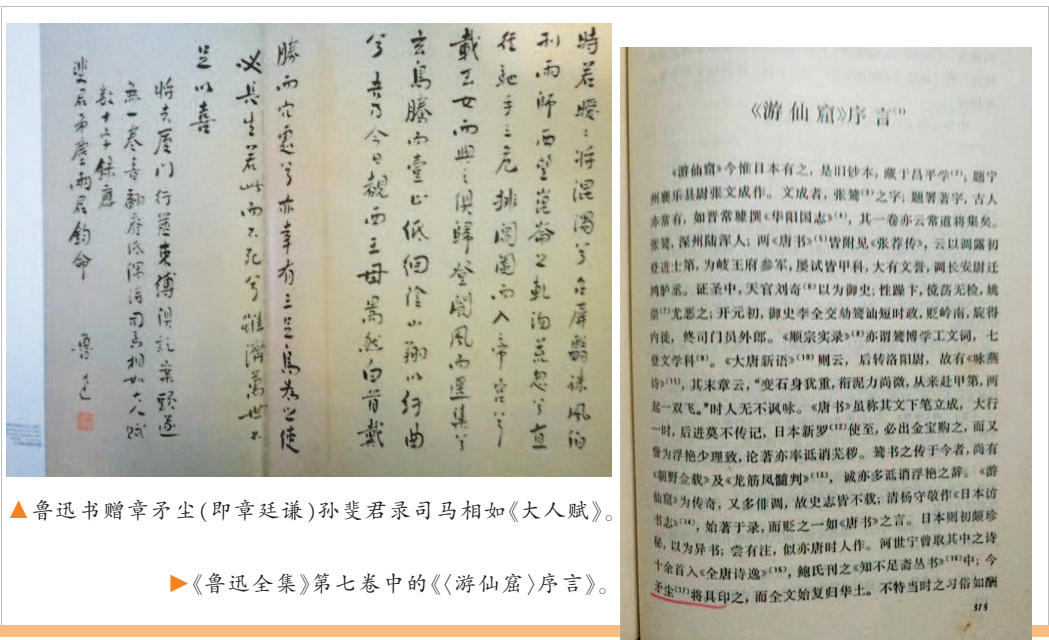
■宋志坚

在鲁迅与章廷谦(笔名川岛)的交往中,有关《游仙窟》标点整理与出版,值得一书。

《游仙窟》系唐人张文成的著作,却不见于中国史籍记载,只在日本流传。直到清人杨守敬著《日本访书志》,方使国人知有此著。章廷谦在北大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时,曾萌生辑录、校订和标点唐代传奇小说《游仙窟》的念头。他的这个想法曾告诉过鲁迅,因而,鲁迅辑校的《唐宋传奇集》没有收录《游仙窟》。对此,鲁迅在《唐宋传奇集》序例中曾有交代:“本集所取,唐文从宽,宋制则颇加抉择。凡明清人所辑丛刊,有妄作者,辄加审正,黜其伪欺,非敢刊落,以求信也。日本有《游仙窟》,为唐张文成作,本当置《白猿传》之次,以章芥尘君方图版行,故不编入。”鲁迅还把自己抄录的《游仙窟》借给章廷谦,鼓励章廷谦把这本书标点整理出版,并且为他的标点校辑本作序。

读鲁迅致章廷谦的书信,可知鲁迅为章廷谦标点、校辑此书所做的,远远不止于此。

在章廷谦标点、校辑《游仙窟》的过程中,鲁迅与他时有交谈,包括面谈与笔谈。这种交谈,乃是一种学术上的研讨与指点。例如,关于《游仙窟》的细注,系唐人所作,日本人所作,还是唐时日本人所作,便是鲁迅与章廷谦探讨的一个内容。鲁迅在1926年2月23日给章廷谦的信中说:“记得日前面谈,我说《游仙窟》细注,盖日本人所为,无足道。昨见杨守敬《日本访书志》,则以为亦唐人作,因其中所引用书,有非唐后所有者。但唐时日本人所作,亦未可知。然则倘要保存古董之全部,则不删亦无不可者也乎耳。”又如,对于俞曲园关于《游仙窟》诗的意见与考据,鲁迅也曾作过认真的



▲鲁迅书赠章芥尘(即章廷谦)孙斐君隶司司马相如《大人赋》。

▶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中的《游仙窟》序言。

思考与研究,并提出具体意见以供章廷谦参考。俞曲园在《茶香室四钞》卷十三中提及《游仙窟》诗时说:“不知张文成为何许人,与崔氏妇女游唱和,竟成一集。”章廷谦原拟将这些话录入卷首,鲁迅在1928年8月19日给章廷谦的信中说,“曲园老之说,录入卷首,我以为好的”,但同时又对俞曲园所见到的是否《游仙窟》之全本提出疑问。1928年10月18日给章廷谦的信中又说:“《游仙窟》诗,见《全唐诗逸》,此书大约在《知不足斋丛书》卅集中,总之当在廿五集以后,但恐怕并无题跋;荫公考据亦不见出色,我以为可不必附了。”此处所说之“荫公”,便是俞曲园。俞曲园在提及《游仙窟》诗时说的那几句话,以后也没有印入章廷谦标点的北新版的《游仙窟》。

鲁迅为章廷谦校点的《游仙窟》作序,其实也远非那六七百字而已。《游仙窟》要出版,鲁迅当然是作序的最佳人选,章廷谦向鲁

迅提出了这一请求,鲁迅没有推辞,也不想以不着边际的三言两语敷衍了事。他在1926年7月9日给章廷谦的信中说:“《游仙窟》上作一《痴华鬘》似的短序,并不需用时,当然可以急就。但要两部参考书,前些日向京师图书馆去借,竟没有,不知北大有否,名列下,请一查,并代借。如亦无,则颇难动手。须得后才行,前途颇为渺茫矣。”鲁迅所开的两部参考书,一部是杨守敬《日本访书志》,另一部则是森立之《经籍访古志》。他还在信中提示:“案以上两部当在史部目录类中。”1926年7月27日将“书目中可用之处”抄出后,就让章廷谦将这两部书还给北大图书馆了。然而,在此不久之后,鲁迅去了厦门,以后又去了广州。他做成《游仙窟》序言,已是1927年7月7日。1927年7月8日《鲁迅日记》记载:“上午寄章芥尘信并《游仙窟》序一篇,又本文一卷。”此序确实不到700字,却系学术研究之结晶,在对作者张文成即张族

鸟的生平及“传于今者”的其他“诚亦多低语浮艳之辞”的著作作了考证之后,就《游仙窟》的来龙去脉以及章廷谦的标点、校辑之意义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:

《游仙窟》为传奇,又多俳调,故史志皆不载;清杨守敬作《日本访书志》,始著于录,而贬之一如《唐书》之言。日本则初颇珍秘,以为异书;尝有注,似亦唐时人作。河世宁曾取其中之诗十余首入《全唐诗逸》,鲍氏刊之《知不足斋丛书》中;今芥尘将具印之,而全文始复归华土。不特当时之习俗如酬对舞咏,时语如矚话婆娑可资博识;即其始以骈俪之语作传奇,前于陈球之《燕山外史》者千载,亦为治文学史者所不能废矣。

章廷谦校点的《游仙窟》付印之后,仍然在鲁迅的不断关注之中。那时候章廷谦在杭州,书是由李小峰的北新书局在上海印的,所以,1928年3月6日,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:“《游仙

窟》不如寄来,我可以代校。”并在同一信中,又说到书的封面:“《游仙窟》以插画为封面,原是好的,但不知内有用者否?”在“代校”的过程中,鲁迅随时发现或想到什么,都及时向章廷谦提出,并为他出主意。例如1928年3月31日的信中,鲁迅说:“《游仙窟》事件,我以为你可以作一序,及周启明之译文,我的旧序,不如不用,其中材料,你要采用便可用。至于印本,我以为不必太讲究;我现在觉得,‘印得好’和‘新式圈点’易[是]颇难并立的。该《窟》圈点本印行后,既有如许善本,我以为大可以连注印一本旧式装订的阔气本也。但圈点则无须矣。”关于俞曲园老人所见的是否《游仙窟》之全本的疑问及其“考据亦不见出色,我以为可不必附了”的建议,也都是在“代校”的过程中提出的。

此书之印刷也是好事多磨。1928年10月12日,鲁迅写信给章廷谦说:“《游仙窟》初校后,印局同盟罢工,昨天才又将再校送来,还要校一回才好。该印局字模,亦不见佳。”以后一拖再拖,鲁迅几次催促李小峰,也不见有什么效果,他知道郑振铎也在排印此书,又见《文学周报》大讲《游仙窟》,以为章廷谦校点的本子必定落后了,谁知在他正感到无奈并为之叹息之时,李小峰将五本北新版《游仙窟》的样书送到鲁迅手上,这真可谓给了鲁迅一个意外的惊喜,他于1929年3月15日写信给章廷谦说:“……不料现在北新本居然印行,郑公本却尚未出世,《文周》之大讲,一若替李公小峰登广告也者。呜呼噫嘻,此实为不佞所不及料,而自悔其性急之为多事者也。”如此这般,其心情之变化、情绪之起落简直就像对待自己校辑的著作一样。

(上接第一版)在《机器与精神》列举的例子中,他也提到了“三·一八”惨案,燕京大学教授 Porter 先生当场对他说,“若使美国政府做出这种事,登时会激起民变起来,但是那天我们国立九校的校长当中还有的态度十分老成,十分镇静,连一个宣言都不大愿意发出”。

“三·一八”惨案“伏尸流血,盈街载道”等惨痛的经历,让林语堂看穿了所谓的“整顿学风”只是当局镇压学生的借口而已。所以,在《学风与教育》演讲中,他明确指出所谓“学风”二字常被误解(更确切地说是被曲解)。“学风好”的标准一度是“不闹风潮,不驱教员,不在饭厅拍桌摔碗,不抱校长而置之大门之外”。这有失学风本意,与讲学之风气无关。他揭开那些持整饬学风论者的黑色面纱:虽然不再用铁鞭大刀毛瑟枪,但他们整顿学风,只是“整饬学校纪律而已,与学问之事何涉,与讲学空气何关?”进而,他具体分析“上焉者最多叫你们考试时不要抄袭,听先生话时记得‘唯唯诺诺’有服从的美德,下焉者叫你们不要在饭厅敲摔饭碗,不要跑到教员家里请教员滚蛋而已。但是除此之外,于你们的学问何补?须知学校纪律严明,

校风整饬,最多教了一群驯羊,按部就班,升级毕业,勉强过了读书的苦劫而已”。

学风的本意是“学问之风气,由风气之感化薰染而造出一读书人来”。用一句话概括,林语堂认为,“读书人不读书,著作界沉寂,学术浅薄,文章萎靡”,才是学风不振的“真义”。一言以蔽之,真正有效的教育,就是使校园形成浓厚的讲学(求学问)风气。

## 真正的读书是一种“心灵的活动”

学生喜欢读书,并且懂得读书的方法,学校才能有好的学风。林语堂在《读书的艺术》《论读书》中,具体谈了关于读书的目的和方法问题。

在林语堂看来,不仅学风失去了“本意”,读书亦然。读书本来是雅事乐事,可如今却完全变了味,今人读书“或为取资格,得学位,在男为娶美女,在女为嫁贤婿”,读书对学生而言,已变成“仅求幸免扣分数、留班级的一种苦役”,诸如此类,都是“借读书之名,取利禄之实”,失去了读书的本意。林语堂同鲁迅一样,不赞同

的是“职业的读书”,认可的是“嗜好的读书”。“兴味到时,拿起书本来就读”,真正的读书是一种“心灵的活动”,可以“开茅塞,除鄙见,得新知,增学问,广识见,养性灵”,是“使人较虚心,较通达,不固陋,不偏执”。“不肯读书之本意,不失读书之快乐,不昧于真正读书的艺术”,读书,要“有胆识,有眼光有毅力”,处处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,“得一分见解是一分学问,除一种俗见,算一分进步,才不会落入俗套,满口滥调,一知半解,似是而非”。唯有“用心吸收其著作”,所读之书,所学之问不久“便似潜生根于心内”。

读什么样的书,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,这是有讲究的。林语堂强调,“世上无人人必读之书,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心境不得不读之书。有所应读,我所万不可读。有此时可读,彼时不可读。即使有必读之书,亦决非此时此刻所必读。见解未到,必不可读,思想发育程度未到,亦不可读”,“世上决无看不懂的书,有之便是作者文笔艰涩,字句不通,不然便是读者的程度不合,见识未到。各人如能就兴味与程度相近的书选读,未有不可无师自通,或事偶有疑难,未能遽然了解,涉猎既久,

自可融会贯通”。读者和被阅读的对象之间也是讲究缘分的,林语堂幽默风趣地把寻找气质相近的阅读对象,比作寻找情人,找到文学上的情人,他“自会有魔力吸引你,而你亦乐于为所吸,甚至声音相貌,一颦一笑,亦渐与相似”。

好玩的是,林语堂读中学时,别的同学挑灯夜战,他却“逍遥游荡,到苏州河边捉鱖鱼,而且搅风搅雨引诱好友一同去钓鱼”,他甚至极端地说,在课堂听讲演,这是“人类虚耗时间之最大的发明”。这并不是说他不喜欢读书,他反对的只是死读书,读死书,功利性的读书,他需要的是无拘无束地自由读书,他想要的是从书本中寻找乐趣。林语堂在《大荒集·序》中说得好,“因为不阿世好,所以也不赶看时行所尚的书。但是有时偶然得一好书,或发现一新者,则欢喜无量,再读三读而获益无穷……栖栖皇皇,汲汲成名,人云亦云,是不足取的;我想从容的,慢慢的,如野游般沿路读来才好”。

“隔日黄花时代越远越有保存必要,有时夹在书中,正是引起往日郊游感兴的好纪念品”,念及当下大学精神状况,今日选取他的五篇演讲稿读读,当不无意义。